



汕头大学是教育部、广东省、李嘉诚基金会三方共建的高等院校，也是全球唯一一所由私人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持续资助的公立大学。在李嘉诚基金会的重点支持下，汕头大学商学院加速实施国际化战略，近年来相继加入亚太商学院联合会(AAPBS)、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负责任管理原则(PRME)、国际精英商学院联合会(AACSB)和新兴经济体商学院联合会(ABBS)，全面融入国际工商管理教育网络，为学院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12年2月，商学院获得EPAS国际认证，工商管理大类本科专业成为亚洲地区首次通过EPAS国际认证的本科专业。

快速发展中的汕头大学商学院

汕头大学商学院施行“教学立院、科研强院、人才兴院”的发展理念，打造特色、创出品牌，建设一所在国内外有影响，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优秀商学院。

一、教学立院

推进先进本科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模式一直是商学院工作重心。目前，汕头大学商学院已初步建成培养高素质创新型管理人才的改革示范基地，形成以工商管理专业为龙头、涵盖相关专业的完整学科体系。

【本科专业】

1、“工商管理”大类本科专业，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三个专业；“工商管理”本科专业于2006年入选广东省名牌专业，2007年入选国家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

2、“经济学”大类本科专业，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两个本科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012年入选广东省特色专业。

【研究生专业】

1、“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含“企业管理”、“会计学”、“技术经济及管理”。
2、“产业经济学”硕士点
3、“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点(MBA)

二、科研强院

汕头大学商学院一向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并为教师的科研工作提供了优良的办公环境和服务支持，鼓励教师们积极申报各类科研项目，参加重要的国内外会议并提供经费支持。近年来，学院教师承担了一批高水平科研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目前在研项目76项，总科研经费超过636万元；该院教师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The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Economic Modelling》等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三、人才兴院

近年来，商学院加快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人才兴院战略。大力推进国际化改革，广纳天下英才，吸引了一批优秀教师。现在学院教师共56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近80%，有海外教育背景的教师比例近50%，外籍教师比例达23%。

根据学院及各专业的发展需要，学院将延揽海内外尤其是两岸四地的优秀人才，建设一支规模适度、国际化和专业化程度高、年轻而富有活力的专职与兼职师资队伍。

多年来，汕头大学商学院一直以100%的第一志愿率录取新生，高分层人数逐年增长。商学院毕业生尤受长江实业、汇丰银行、高露洁等国际知名企业的欢迎，被世界500强和知名跨国公司聘用的本科毕业生人数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一次就业率达95%以上，最终就业率达到100%，远远超过全国大学平均水平。绝大多数毕业生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平均薪酬连年大幅提升。著名商界领袖李嘉诚先生对汕头大学商学院的发展十分重视和关心。他亲自为商学院同学主讲“赚钱的艺术”、“奉献的艺术”和“管理的艺术”。由他亲自开讲的“经济沙龙”至2012年11月已举办超过113期。“经济沙龙”遍邀企业界、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等天下名师与本科同学交流和互动，在全国尤其是粤东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

学院正以崭新的面貌和国际化的办学模式迎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在汕头大学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汕头大学商学院正以“功在商道，心达寰宇”(Enterprising Achievement, Global Mindset)为使命，立志在较短的时期内办成国际化、有特色的商学院。

人类最近50年经历了科学技术的巨大飞跃，包括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在生产跟消费上也都经历了巨大的进步。经历了这么大的进步，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少的人员来生产一个单位的GDP? 比较直观地讲这是对的，但是现实当中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

全球能源挑战和中国应对

林柏强 新华都商学院副院长

我算了五十年的数据跟十年的数据。五十年GDP是3.4%，一次能源是2.6，十年GDP下去一点点，能源上来一点点。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十年单位GDP能耗比五十年平均更高一些，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通常觉得技术进步可以以更少的能源产生GDP，这个想法不一定对。发达国家可能可以用比较少的能源来生产单位GDP。

第二，经过这几年对太阳能、风电的认识，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能源? 2010年以后煤炭成为人类最主要的能源品种。煤炭排放是最大的，如果往前走，可能遇到我们没法解决的能源问题。

接下来，前十年——2004到去年，中国火电装机大概增加了5亿千瓦，这些排放基本都锁定了。经过十年，我觉得印度跟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中国城镇化过程，仍然是基础设施大幅度建造的，如果我们没有更好的低碳设计，更快地研究出相对应的经济制度，是不可能的。市场制度对资源和环境是有压力的。由于资源需求的问题，还有外部环境问题，这个成本是滞后的，我们可能目前没有办法对环境的外部定价。所以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把人员价格大幅度提升的时候，那时候对市场引导的信号就削弱了。

估计2020年全球人员补贴超过5000亿美元，这也是现状。

另外一个方面，技术进步是否可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理论上讲技术进步肯定减少耗能，提高教育。如果对上百年的数据进行跟踪，事实上伴随着每一次技术进步，我们消费更多，而不是更少。这里可能有反弹效应的问题，也可能有能源资源架构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理论上讨论是一个方面，现实当中发生的往往与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市场制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技术进步可能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讲中国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后发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后发的劣势也有，其中就有环境跟资源应该是后发劣势中很重要的一条。为什么这么说? 发达国家目前的蓝天白云，资源的可持续性，实际上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资源不可持续性为代价的。就是说不仅仅是中国人消耗自己的环境资源，而是全世界都在消费，这是后发劣势当中很典型的体现。看看中国近十年的发展，能源消费比重增大，2002年占不到13%，2011年占22.4%，这个可以肯定的是从现在开始，中国在能源问题上，环境问题应该说是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实当中我们讨论改变工业结构，改变生产方式，我觉得上个五年计划肯定是充分讨论过了，再前面也讨论过了，但是现实我

们看到什么东西? 中国工业化趋势在不断加重，而不是在减缓。2002年重工业是61%左右，到2011年重工业是72%。能源结构——我们说煤炭不好，2002年我们煤炭能源占到64%左右，到2011年我们接近79%。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大幅度增长，以及能源结构的问题，与这两者相关就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大幅度增长。2002年排放大概是42亿吨左右，2011年达到了94亿吨左右。我们看欧盟和美国都下降了3亿吨左右，也就是发达国家花巨大的努力在二氧化碳中取得的成效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却在大幅度地增长。可以这么说，尽管我们在低碳发展方面有很多讨论，但比较准确地说，人类现在前所未有地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今后的能源需求等于能源供给加上节能，如果用市场化手段可以在能源供应以及节能之间做选择，这是市场化的选择。节能需要投入，能源供应也需要投入，你可以做最优的选择。

如果用行政手段，就是所谓的能源总量控制，把它控制在某一个点上，按现在说法是40亿吨的标准煤。它的含义是如果你有更多的能源需求，可以通过节能解决问题——给你的能源就那么多。现实当中这个怎么执行? 还需要进一步看配套和执行状况。如果我们有一个最优的能源供应量，或

者行政选定的能源供应量，我们可以通过对减排目标的设定，强制性地导出一个能源结构，越干净能源成本越高，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可被接受的能源结构。

关于能源安全——这是对2035年各个国家的汽油做的预测。中国、欧盟大致不变，美国是朝比较低的依存度走，这说明了中国目前能源安全的基本问题。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理论上也无法得出某一个国家对外依存某个点上是安全或者是不安全的，但是横向比较而言，我觉得美国跟中国是有可比性的。到2035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在80%左右，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可能更快一些。

解决能源安全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是进口，十年来我们并没有多元化，这是不成功的。接下来就是能源替代的问题，必须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目前有天然气跟电动汽车，做得不是很好。加快能源价格改革，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城镇化也是一个渠道，我们可以从城市规划的设计当中就计划好。天然气在未来三五年之内替代煤炭，使之下来三个百分点左右。天然气发展潜力很大，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包括水资源的短缺。大规模远距离的输电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特高压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这应该也是解决我们环境问题的重要方面。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刚来中国不到5个小时，所以让我讲中国经济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个很大的挑战。我想先宏观地来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给大家一些解释

中美德市场经济模式，谁主沉浮

吉尔菲·索伊加(Gylfi Zoega)

冰岛大学经济系教授
冰岛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

首先我们看一些基本数据。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是非常迷人的国度，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发展得非常快——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转型到了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里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就是由于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主要是因为人均收入相对较低。虽然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同时又是非常低生产率的国家，尤其是人们生活水平对比一些中等水平的欧洲国家来讲，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国内人均GDP的情况，完全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生产率的对比，可能不到美国一半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二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同样也是有快速的增长，这些都是基于德国和日本逐渐引进美国的技术来实现的。当然了，我们后来也做了一些自主创新。所以说，这些国家发展非常快速。但是后来他们却没有能力真正地赶超美国，主要是由于自主创新的停滞。

中国从1978年到2012年，也是通过进口外国技术来发展的。对比日本和德国，中国的发展也是随之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美国的崛起也是与美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不平衡性伴生，这自然带来一些问题；中国的发展同样也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其中也包括一些大规模地区的衰退。我们看到在大衰退时期，也是由于西方世界不断增加的不公平性，还有金融部门，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失业率不断提高，特别在年轻人当中这些问题的滋生所带来的。这也使得这些国家的不平衡性逐渐加深，还有关于通货膨胀，还有房屋价格的过度提升。

这些不平衡性的过程在中国出现。比如房价过高，还有通货膨胀，实际上这是一个国家经历衰退的过程中会出现的情况。中国可能会经历“熊彼特大衰退”的过程。在衰退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美国是赤字，而在德国则属于一个有结余的国家。那么，在欧洲，我们看到德国等一些国家还是能够实现经常账户的平衡，但是从大衰退当中，受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赤字国家。关于生产力的增长来源，我们可以区分自主的创新，以及开创性的创新。熊彼特的框架有一些描述，关于企业家如何拓展他们的商业实践，以及采取新的技术。这些创新可以包括一些新市场、新的原材料、新产品、新市场的组织性变革等等，这些都是创新的领域。这种发展也是取决于技术本身，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这种经济体如何吸收这些概念的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

在美国和英国，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情况，主要是在19世纪左右出现了增长的前沿。如果我们看一下生产力的增长在不同国家的情况，就可以分析出这些生产力的增长的情况，如何拓展到其他这些生产力的边缘之前有三大工业革命，也是能够不断地拓展这些增长的影响力。



●冰岛大学经济系教授、冰岛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吉尔菲·索伊加(Gylfi Zoega)

一、人均GDP与其他国家人均GDP的比较，我们选取了125个国家。经过变量交换，我们可以获得一系列的研究结果。比如，我们把125个国家进行分析，然后与中国进行对比。因为中国现在逐渐成为了一个经济强国。这里关于人均GDP，还有国家人均GDP之和的比较。通过80年代、90年代、2010年收入的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高收入国家的差距更加明显，当然这两类国家中间是会出现融合的，这也是其中一个事实。再看一下人均的产出，全世界有两类不同国家，一类收入比较高，一类收入比较低一些，但是让这两类国家互相进行对换，相对来说出现的几率比较小。比如，我们看到像香港这样的地区，在80年代的时候，对比现在它的增长，实际上出现了回调，但这种例子是比较少的。从1980年到2010年，我们可以看一下韩国，它是在比较低的点，但是2010年就在比较高的一个点。有些国家主要是在一些边缘地区浮动，比如墨西哥，但也有一些国家从比较低的阵列向比较高的阵列发展。

第三个因素就是在比较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趋同的情况。在比较穷的国家阵列当中，通常不会发生。我们可以看到收入在比较低收入的国家开始逐渐往下发展，实现了这种趋同。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比如说，在中国香港，原来是在高收入阵列，中国台湾原来是在比较低收入的阵列，后来慢慢转向高收入阵列。像中国的大陆地区，自从80年代开始有了强劲的发展，但是总体平均来讲，还是在低收入阵营里面。尽管像一线城市、上海很接近高收入群体了，但是还有很多省拉低了平均水平。因为中国作为总体来讲，还是有一些生产率比较高的地区，但是这些高收入地区没有办法主导全国的情况。再来看看2011年底的中国的人口情况。我们看到有一些省市人口非常多——我们在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很难想象这么多省有这么多人。有些省的生产率是相对比较低下，但相对来说，人口又比较多。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31个省市，在31个省市里面相对收入分布密度做一个分析。80年代的时候，相对来说有一些区域是较高的点，比如上海和北京，然后这种分布变得比较拓展了，有一些高收入的省市开始出现了一些增长，这种增长是遍布全国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些省市的排名情况，比如上海、北京、天津，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全国总体的情况。还有一些省市，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上海，处于中国的沿海地区，属于一些高收入的区域。还有一些省市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如果你能计算一下区域性

列当中，通常不会发生。我们可以看到收入在比较低收入的国家开始逐渐往下发展，实现了这种趋同。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比如说，在中国香港，原来是在高收入阵列，中国台湾原来是在比较低收入的阵列，后来慢慢转向高收入阵列。像中国的大陆地区，自从80年代开始有了强劲的发展，但是总体平均来讲，还是在低收入阵营里面。尽管像一线城市、上海很接近高收入群体了，但是还有很多省拉低了平均水平。因为中国作为总体来讲，还是有一些生产率比较高的地区，但是这些高收入地区没有办法主导全国的情况。再来看看2011年底的中国的人口情况。我们看到有一些省市人口非常多——我们在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很难想象这么多省有这么多人。有些省的生产率是相对比较低下，但相对来说，人口又比较多。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31个省市，在31个省市里面相对收入分布密度做一个分析。80年代的时候，相对来说有一些区域是较高的点，比如上海和北京，然后这种分布变得比较拓展了，有一些高收入的省市开始出现了一些增长，这种增长是遍布全国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些省市的排名情况，比如上海、北京、天津，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全国总体的情况。还有一些省市，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上海，处于中国的沿海地区，属于一些高收入的区域。还有一些省市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如果你能计算一下区域性

的趋同，那么从平均角度来讲，这些比较穷的省市开始逐渐地追赶一些较富的省市。这里我们还是看到一些地区的趋同情况，相对一些比较富的省市增长较缓。

如果我们看一下生产率，这是以人均GDP为基础的，我们看一下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再把中国放到这里面进行计算。它的增长本身是很快的，尽管人均GDP比较低，也是80年代到2010年以后的增长，这个生产率的增长是遍布31个省市的，所以大家看到北京地区，还有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的不同代表。总体上中国是较大的国家，但是生产率的增长是四处可见的，这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投资。使用尼尔森菲尔普斯的等式来测量中国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还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我们的结论就是，高收入和低收入是两个明显的群体，另外这两个群体之间没有这种趋同的趋势存在。而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也有一些低收入的群体，而这些高收入群体的趋同趋势是比较弱的。中国正在逼近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人均的生产值还是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上海还不及美国的一半。中国要赶上美国的水平，GDP总量肯定要非常大，至少要达到三倍这么高。所以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创新方面。很多美国的创新型公司的良好经验也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的，要更好地增长，必须要更平衡地增长。